荒煤不荒 “煤”是金矿

——纪念陈荒煤先生诞辰110周年

何建明

今天是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首任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一百一十岁诞辰。对我和在我以上年龄的文化界人士来说,“陈荒煤”的大名实在是如雷贯耳。幸运的是在他晚年,我与他有过一段忘年之交。

陈荒煤先生1913年12月23日出生在上海,所以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沪生”,而“荒煤”是他的笔名,所以日常里大家都称呼他“荒煤”,就像“巴金”并不是本人名字一样,却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深深地烙下。荒煤先生是一位革命文学艺术家,在延安时就是“鲁艺”的文化教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首任国家电影局局长,并且担任的时间十分长,后又出任主要分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在他领导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几乎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改革开放之后,他又是一大批优秀作品的重要推手。故有人称荒煤先生是“新中国电影之父”不是没有道理。

许多人甚至并不知道他同时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是因为他这个领导职务,我才有幸认识并成为他的下级,与他有了交情。荒煤还有另外两个职务与我的文学成长就更密切了。一是他在1995年原《中国作家》杂志主编冯牧先生去世后,接任主编,而我是他之后的第三任主编。荒煤同时又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首任会长,而我是第三任会长。正是这两个职务关系,我们才有了一段“忘年之交”的岁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一个文学刊物任主编,那时我对文学界和中国作协都不熟悉。因为办杂志,认识了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化部副部长的荒煤。那时,文学非常热闹和繁荣,包括报告文学在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也在此时成立,首任会长是荒煤和徐迟。设“双会长”是考虑到徐迟当时因“哥德巴赫猜想”而名声太大,但同时他又是一位纯粹的作家,平时不在北京,所以学会领导工作必须由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荒煤因此被大家推荐任此职。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荒煤写报告文学,早在延安时就有了一批作品,比如《陈赓将军印象记》《模范党员申长林》等,应该说他是解放区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家。那时夏衍先生在上海,写下了著名的《包身工》。他们一个在革命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所以有人称他俩是当时的中国报告文学“双子塔”,对后一代像我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影响巨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很年轻,荒煤和冯牧先生比较喜欢我,估计是我有部队经历且又是一名年轻作家来当文学杂志主编的缘故,所以我每次邀请二老参加文学活动,他们几乎有求必应。有意思的是,那时我们经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后就在前门西边地铁口的一家湖南火锅店吃便饭,二老对我这安排特别满意。“跟着建明吃火锅”便成了荒煤和冯牧二位长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自然更卖力了。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当时的领导都是官员,不便张罗具体事务,但学会又没有经费。我当时办杂志时还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蛮能赚点钱,主要跟中国作协的同志一起编书。后来每年学会办年会和春节联欢活动,我就是负责出钱和跑腿的角色。我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竟然接班荒煤、徐迟,出任第三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并一直担任了整整十年。不用说,在报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荒煤作为老会长对我的直接影响是多方面和巨大的。他老人家送我的一幅书法,就是他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写作的见证:

文学是人学,反映人间情。

写人要感人,唯求形象真。

深情动人心,但应德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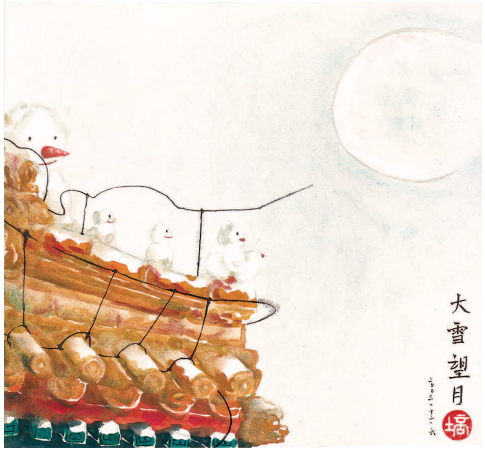
哺育新一代,培养接班人。

这40个字,饱含了深刻的文学艺术的思想,是荒煤从事革命文艺一生的精髓,也是他对我教导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重礼,胜于泰山。细细读来,可以品出无限深刻而通俗的真理,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真谛,令我受用一生。

许多不曾想到的事后来竟然都发生了:1995年,《中国作家》创办人、主编冯牧因病去世。谁来当这份国家级文学大刊的主编,一时定不下来。后来知道是冯牧的好友荒煤先生接任。那时我正办理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手续,后来又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社。无巧不成书。荒煤任主编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年龄又大,基本都住在医院。我是杂志社总编室主任,与他联络的事自然成了我的一项工作。这期间我有机会几次与病榻上的他交往。当然借看望他的机会,理所当然坐下来请教他一些工作和写作上的事。平时荒煤先生说话不多,但谈起创作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时,他会滔滔不绝。他对我说:报告文学创作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吃苦最多。因此,多跑,多看,多调查研究,然后多思考是基本功。他又指出,文学必须求新、求真、求艺术感,写好一部作品,就得有独立创新和思考的空间。报告文学是个新文体,但我们的祖宗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史记》这样伟大的纪实性作品,因此中国就是报告文学的“发明国”“实践地”和创造过“经典”的国度。我们要迈向更高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和人民喜欢的高峰。荒煤本人既是文学理论家,又是作家,所以他的话对创作者十分管用。我的文学之路没有过老师,而荒煤先生实际上一直是我创作路上的导师,他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巨大,终身受益。

1996年10月25日,荒煤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是文艺界的重大损失,尤其对我们《中国作家》杂志社来说。当时中国作协的杂志主要领导配备都是部级领导,所以荒煤去世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作家》主编,只有“常务副主编”,这种情况维持了数年,直到2004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由我主持工作,并很快任命我为继冯牧、荒煤之后的第三任《中国作家》主编。老实说,当时才40多岁的我,既感不胜荣幸,又觉担子很重。也正是因为我的前任都是文学大家,他们的言传身教,给我力量和方向。

几年后,我又担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负责人,并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然,还有创作……回想往事和自己成长的过程,从与荒煤并不太长的交往岁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地方,尤其是荒煤先生,这个“笔名”如同他一生文学艺术成就一样:荒煤不荒,其“煤”则如一座让我们后辈取之不尽的金矿。



大雪望月 (插画) PP殿下

用爱好温暖冬日

默音

到北京和老友重聚,F送给我一只她雕的小狐狸。并非写实的雕刻,更近似卡通。圆头圆脑,大尾巴,小眯眼,透着娇憨。比起惊喜,我的讶异更多,连声说,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也太牛了!她说,原来就对木工感兴趣,之前的冬天,外出经常受限,总待在家里,就发展了一下小爱好,也没有专门拜师,看书和视频自学的。我忍不住又说,你这水平可以开店!F笑着说,做着玩送朋友而已。

聊天之间,F讲了小狐狸的诞生过程。最初只是一个小木块,用铅笔画出简单的雏形,然后动手削木头。F说这个阶段最解压,因为不用思考,下手也不用顾忌太多。到了后来,要精修,要打磨,都得小心,错了可没法重来。家里没有专门当作工房的房间,打磨的时候,她在浴室里坐个小板凳,戴着口罩工作。

每一项爱好都需要时间,随着沉迷愈深,也要投入一定的金钱。F说理想的状态是若干年后到乡下居住,弄个小小的木工间。聊着聊着,我想起自己也在若干年前的冬天沉迷于毛线编织,更早之前则是做烘焙,便讲给F听。这些是她不知道的,大概我的形象和打毛线有些远,她大笑起来。

沉迷一件事的契机有时很简单。我帮一个爱编织的朋友从日本网站买毛线,网站有模特图,清秀的女子被帽子、手套、围巾和毛衣包裹,显得暖和又慰藉。我想,毛衣太复杂了,总可以试试围巾吧。

妈妈是打毛衣高手,我小时候的毛衣毛裤都出自她手。邻居家的女儿有件带猫咪图案的毛衣,妈妈借来数了针数,按我的尺码重新计算,很快织成一模一样的。我至今记得,那是件红毛衣,正面坐着一只很乖的白猫,猫的眼睛是两粒扣子。

我并没有去向妈妈讨教怎么织毛线,因为她一定会说,有这个时间,你不如买现成的。我直接下单“围巾套装”,针和线是配好的,附带编织图,照图工作即可。那时我在出版社当编辑,用吃完午饭剩下的一点午休时间织几行,权当放松头脑,没想到很快在隔壁办公室掀起编织的浪潮,人事和印务都开始跟着买毛线。她们比我手巧,很快出品一条条围巾,并开始帮编辑们织。那个冬天,同事们都围着毛茸茸的手工围巾,现在想来仍有余温。

做蛋糕或织毛线,共同点是一种家的意象,也许是其中的暖意让我曾经投入大量的时间。不过,最终这两样爱好都被搁置了。尤其后者,对颈椎不太友好,的确不适合文字工作者。最近半年,我开始观鸟。一向怕冷的我在十一月去了北京,到沙河,在寒风中待了一整天,心却是暖的。有爱好真好,无论那是向外探索抑或手工劳作,都足以让人度过漫长的冬天。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藏书

李志石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家从乡下搬到县城,又从县城搬到了都市,每次搬家最头疼的就是搬书。家里从开始的一个书柜到一排书橱,再到独立的书房,几面墙壁都排满了到顶的书柜,里面还放了一个折叠扶梯,方便去取最上面的书。

一个普通的家庭藏书多了,便多了书卷气和乐趣。有时候丢了一本书,就像丢了魂似的,心里空了一块,那是满满的遗憾。家里书多,搬家时只能忍痛割爱,不得不丢弃一部分书,真有一种“晨曦破晓迎阳光,暮色渐降伴星沉”的心境。

现在,家里藏书的人越来越多,哪怕是小房间也要有个放书的地方;许多书即使从来没翻过,还是要留着。一些人看纸质书少了,理由是工作忙,家里琐事多。有人说,等退休以后闲下来去翻翻书。这正如钱歌川所说:“所有的藏书家都抱着一个期待,要在他辛苦多年,把生活问题解决之后,便摆脱一切俗务,把自己关到书房中去,每日用充分的时间,来发掘那无穷的宝库。”

年纪大了,体力不支,许多日用品旧了都想扔掉,唯独书舍不得丢掉。难题总有破解的办法。老家有一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几十年的学者,九十多岁了,想把很多有价值的书运回老家的图书馆。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海里,都蕴藏着一颗颗珠贝,如能保留自己的果实,那是一种运气。图书馆负责人派专人专车帮他运书,并腾出地方,列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专柜,让这些宝贵的书籍有长久的安身之地。我去现场看了,让我拜倒辕门。

有一位老大爷要去养老院,他问儿子什么东西留下。他儿子说,只要把你床底下的几瓶茅台和五粮液留下就可以了,其他的包括那些书统统扔掉。老人悲不自胜,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最后只带走两本书,其他的都让儿子卖废品了。

许多书是很珍贵的。书摊上那些按斤两卖出的书,有些是孤本,错过了一个机会,以后就很难收藏到了。去淘书当然很辛苦,有时候泡上一天,也只能拣到几本有价值的书。有些地摊上的书价格也不低,当时定价1块多的书,现在卖到20块。但只要有收藏价值,也是很划算。闲暇时我也经常去那里淘宝。

藏书不是为了装门面。一次,我到一家饭店吃饭,看到包间里藏有很多名著。开始,我想这家饭店的老板蛮有文化的,但当我走近伸手去摸那些书时,发现书是用板做的,还像模像样喷上了封面和书脊,那些所谓的“精装本”看起来很有气派。

当然,也有人很乐意做藏书善事。我去过杭州上城区一座藏书楼,1931年建的,浙江都督杨寿潜遗嘱捐资,其子杨拙存提议建造。两层的仿西洋式建筑,立面采用西洋古典横三段式处理,中间十六根陶立克巨柱,把建筑立面分割为十五间。檐壁正中是蔡元培所题的馆匾。这笔民间遗产多么贵重啊,让我肃然起敬。

现在年轻人喜欢看电子书,当然无可厚非。但我总感觉看纸质书还是有着不可比的味道。书,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即使没有大块的时间系统阅读,有空的时候随便翻翻,总是好的。藏书里是充满学问的,它毕竟属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学问的人。

一言难尽说体检

简 平

我总苦口婆心地劝别人要定期进行体检,这是现身说法,如果当时我拒绝体检,并且在体检项目中不选择胃镜检查,那很可能就发现不了潜伏着的恶性肿瘤。而恶性肿瘤这玩意非常阴险,隐匿很深,等到各种症状显现出来,基本已是中晚期了。

我小妹夫是个律师,身体很好,平日里不停锻炼,每周还固定打几次乒乓球,左削右扣,动如脱兔。我小妹妹和他的女儿让他每年做一次体检,他却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时间,还说身体有没有状况自己最清楚。结果,那年国庆节前,突然感觉不舒服,去医院看病,随即查出晚期肝癌,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无法动手术了,病势凶狂,回天无力,才两个多月便离开了人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小妹夫对我说,应该要每年做个体检的,侥幸不得,早些查出问题来早些治疗,不至于耽误了时间。

如今,每年做一次体检已被大多数人接受,有人虽然不情不愿,但被亲朋好友四面围追堵截,也只好就范。比如我大妹妹就是这样,我和我小妹妹跟她说了多次,让她必须一年做一次体检,可她无动于衷,嘴里说好,却不见行动。于是,我小妹妹干脆先礼后兵,直接网上预约,前一夜,下一道“最后通牒”,次日一早“从天而降”,亲自陪着她去做体检,有点绑架的意思了。几次下来,大妹妹为了不让我们又是唠叨又是紧逼,也就自觉“革命”了。

不过,随着体检的愈益普及,各种奇葩之事便也接踵而至。先前,做体检都是去的医院,可现在体检公司应运而生,遍地开花,不仅价格远比医院低,而且还设在楼宇大厦,甚至豪华宾馆,名曰“更好的体验”。我们单位也曾改弦易辙,让我们从医院改去一家体检公司好好体验。但关键是体检不是体验,譬如我多年来每次体检做颈部动脉B超检查,结论都是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形成,不料,此回居然是完全没有,这体验当然是够好的了,不治而愈,神奇至极。可细细想想,未免有些天方夜谭,所以,第二天还是特意去医院专门再做一次检查,果不其然,病灶犹存。有趣的是,不是我一个人,而是相当多的人此次因“体验”良好而病症消失。最后,单位不得不在我们的央求下,复归医院体检。

可是,也别以为医院的体检一定就是靠谱的。我们几个子女孝敬母亲,多年以前就让她每年去一家大医院做体检。有一次,体检结果显示肝部有一个囊肿,我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每年体检时都重点检查,连续四年,结果都说是囊肿,大小形状没什么太大变化,这让我们体检前的紧张忐忑稍稍有了些松弛。可我们总不大放心,便拿着体检报告追问需不需要治疗,回答是不需要,明年再来定期复查。谁都没有想到,已经没有明年了,体检过后没几个月,母亲因肝区疼痛去了专科医院,我们拿上她每年的体检报告,一位医生一看就皱着眉头说,四年前的那次体检就可认定是胆管细胞癌。我们无语凝噎,心里满是愧疚,体检的目的是查问题,要是有问题就应刨根究底,而不是轻信那一句标准化的格式用语“随访复查”。如果第一次体检报告就给有经验的医生去研看,母亲的病情何以发展到不可收拾。

所以,对于体检,我的态度很明确:第一,必须每年都做;第二,必须拿着体检报告多找几位医生看看,听听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不当回事,束之高阁。

十日谈

体检故事

责编:殷健灵

“有点毛病是好事。”我尊敬的一位前辈说。明请看本栏。